

英藏黑水城文獻

K871.70
2082
/

阅 览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國國家圖書館

編纂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 黑水城文獻



①

Or.12380
0001-10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英藏黑水城文獻.1/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2

ISBN 7-5325-3996-2

I. 英… II. ①英…②西…③上… III. 出土文物—文獻
—額濟納旗—西夏(1038~1227)
IV.K87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1308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英藏黑水城文獻 ①

編者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中國寧夏銀川市西夏區 郵政編碼 750021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英國國家圖書館

英國倫敦尤斯頓路96號 NW1 2DB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印製 上海古籍印刷廠

英國國家圖書館底片。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圖版版權 © 英國國家圖書館

文本版權 ©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開本 787×1092mm 1/8 印張 四一·二五

插頁 六一

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3996-2/K·685

1740.50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in
the British Library

①

Or.12380

0001-1000

Edit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Shanghai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in Britain
Volume 1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

96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DB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xia distrlt. Yinchuan. Ning Xia 750021. China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Plates Copyright

© British Library

Texts Copyright

©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8 mo 787 × 1092mm

printed sheets 41.25 insets 62

First Edition: January 2005 First Printing: January 2005

ISBN 7-5325-3996-2/K·685

英藏黑水城文獻

中方主編 謝玉傑

英方主編 吳芳思

學術顧問 李範文

監製 任維楨 王興康

副主編 束錫紅 趙昌平 柴劍虹 許生根 府憲展

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興康 任維楨 束錫紅 吳芳思 吳建偉
府憲展 胡若飛 柴劍虹 許生根 張爾晶
趙昌平 謝玉傑

執行編輯 府憲展

責任編輯 劉景雲

裝幀設計 嚴克勤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in Britan

EDITORS-IN-CHIEF

Frances Wood (UK)

Xie Yujie (China)

CONSULTANTS

Li Fanwen

SUPERVISORS

Ren Weizhen Wang Xingkang

DEPUTY EDITORS-IN-CHIEF

Shu Xihong

Zhao Changping

Chai Jianhong

Xu shenggen

Fu Xianzhan

Editorial Board

Chai Jianhong Frances Wood Fu Xianzhan

Hu Ruofei Ren Weizhen Shu Xihong

Wang Xingkang Wu Jianwei Xie Yujie

Xu Shenggen Zhang Erjing Zhao Changping

EXECUTIVE EDITOR

Fu Xianzhan

EDITOR-IN-CHARGE

Liu Jingyun

COVER DESIGN

Yan Keqin

Contents

Preface

Frances Wood

19

Preface

Xie Yujie

21

The Etsin-gol Delta and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Extract from Innermost Asia Chapter13)

Marc Aurel Stein

33

Editorial Notes

44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ppendices

序言

謝玉傑

一、西夏王朝和西夏文

在繁盛一時的唐王朝灰飛烟滅以後的100年，原先活躍在川藏草原的党項羌族在中國西北地區崛起。這就是被稱爲『西夏』的地方民族政權。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建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即今寧夏銀川市），轄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的廣大地區。西夏共歷十帝，享國一百九十年。前期與北宋、遼鼎立，後期與南宋、金對峙，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了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面。

這是一個文化事業甚爲發達的王朝。早在立國前夕，開國皇帝李元昊命令骨勒茂才創製了記錄党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時稱爲『番字』、『番文』或『番書』，後世稱『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國同時通行西夏文和漢文，也使用藏文。西夏王朝既注重党項族的傳統文化，又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學，學宮庠署遍于都府州縣，又弘揚佛教，完成了用西夏文翻譯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的浩大工程，建立了衆多的寺廟，創造了絢麗的藝術。西夏佛教有着多樣的來源、多種的典籍。

這是一段悲壯的歷史。處于游牧和農業之間的民族，就像在冷暖交鋒帶一樣，總是風雨不停、霜雪交加。公元1227年，西夏經歷了蒙古帝國鐵騎的五次征伐後，終以首都中興府的陷落和末帝的被殺而宣告滅亡。蒙古軍隊爲報復西夏的激烈抵抗，以及出于追懷成吉思汗去世的宗教理念⁽¹⁾，進行了殘酷的屠戮和焚掠，使大批西夏文獻、文物遭到毀損。元代初期，党項人作爲『色目人』的一部分，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認同；而西夏文字，則繼續流行，最著名的是党項人管主八在杭州主持刊刻的『河西字大藏經』。一直到明代萬曆以後，還有西夏文佛經的刊刻，而党項民族則逐漸流散融匯于其他

民族之中。西夏在正史中僅附于遼金元史，歷來重視不多；西夏文由于極少使用，也就湮沒無聞，直到十九世紀初人們重新發現的時候，已經不知道這是什么文字。

當一個業已消逝的王國只留下了不多的傳說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初，忽然大批的文獻資料被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斷層可能被填平了，當人們發現這不只是幾件珍寶而是一個王國的時候，激動的不僅僅是歷史學家，而是人類本性流露的一個巨大好奇：我們的先民們怎么了？

二、黑水城和黑水城文獻

大批西夏文獻被發現的地方叫黑水城。蒙古語爲『Khara-Khoto』，意爲黑城；又繞行城外有『Khara-gol』，意爲黑水。黑水（就是古代傳說鴻毛不浮的『弱水』）流過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農田草場，使這里成爲宜農宜牧的綠洲。西夏王朝于此設置監軍司，作爲北方的軍事重鎮。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亦集乃』爲西夏語音，『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譯成漢語爲『黑水』。『亦集乃』即今稱『額濟納』，均源于西夏語音。

黑水城遺址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蘭庫布鎮東南25公里，在兩條干澗的河床匯合處的荒漠臺地上。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由于戰爭截斷上游河道，河水改道北流，綠洲被沙漠吞噬，最後這座城市終於成爲無人居住的死城。黑水城極端干旱的自然條件威脅着人們的生存，但高溫干燥却是保存古代文獻、文物的最好條件。黑水城文獻文物就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幸存下來的。

1908年，俄國科茲洛夫P.K.Kozlov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發現了西夏文文獻，受到歐洲東方學會的高度重視，他們受命改變到別處探險的計劃，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繼續發掘尋找，遂有在遺址西面河岸邊『著名的』大塔的重大發現。科茲洛夫兩次發掘，總共獲得8000多號文獻，近千件藝術品和考古材料。這次發現，被譽爲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并稱的二十世紀初最爲重大的考古發現，爲西夏學和其他各項研究奠定了材料學的基礎，并形成泱泱大觀的嶄新學科。

1914年5月，斯坦因A.Stein結束敦煌沿綫烽燧考察之後，取道玉門、酒泉，沿着額濟納河到達黑水城。據記載，他首先在城內發掘了幾處寺廟、寺塔廢址以及城西的垃圾堆，主要在城東北角的廢塔遺址K.K.III.找到了大量寫本；而在距離城西北角大約400米的河邊塔基被定爲K.K.II.的地點，發現了西夏文寫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漢文寫本59

件、印本 19 件，吐蕃文寫本 13 件。而實際上，現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夏文文獻的編號為 4000 號以上。

如同斯坦因各次探險的報告系列一樣，一般都有一個簡略的旅行記，一份詳細的研究性質的報告，前兩次中亞探險發表了《沙埋和闐廢墟記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和《古代和闐 Ancient Khotan.》、《沙埋契丹廢址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和《絲綢之路 Serindia.》。第三次中亞探險則是首先完成詳盡的考古報告《亞洲腹地 Innermost Asia.》。在《亞洲腹地》的第一冊第十三章中，介紹了對黑水城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察發掘情況，詳盡介紹了編號為 X、Y 系列 I、II、III、IV、V、VI、VII、VIII 等各個地點的出土情況，以及數百件文物的描述⁽²⁾。本書翻譯了其中關於發掘過程的主要內容。

三、英藏黑水城文獻概況

黑水城之所以引起國際東方學界的注意，首先起于俄國科茲洛夫的發現。不過科茲洛夫雖然受到普爾熱瓦爾斯基 N. M. Przhevalskii 的教導和影響，但是在考古學方面顯得並不專業，挖掘過程並沒有計劃。他們第一次到達黑水城的時，在城內城外到處挖掘，收穫不小，尤其是找到了西夏文字，在歐洲東方學界的指導下，使得他們重返黑水城發掘『著名的』大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無論哪次發掘，都沒有詳細的或者簡要的記錄，造成文物和出土地點信息的分離，使得後人無從追溯；所有的文物都混淆在一起，甚至對於『著名的』大塔的發掘，也僅僅留給後人一些互相矛盾的描述⁽³⁾，以致即使擁有全部存世西夏文獻總量的絕對多數的俄藏材料，也很難確定這個『著名的』大塔的上下年限。

斯坦因所獲雖以碎片為多，但因其發掘程序的嚴格而留給後人以可信的信息。斯坦因記錄了唐『永泰二年』的正式文書，其出土地點 X、Y 為城西南角的清真寺，因此可以證明黑水城的上限可能在唐代。雖然從出土文書上這是個孤證，有些專家懷疑此件出于其他地區，但綜合額濟納河沿岸的古代遺址，有北周的大同城等，所以發現唐代文書也是合理的。由于斯坦因嚴格記錄了出土地點，通過這些地點出土文獻的類型，我們知道了某一遺址曾經是官署或者寺廟或者民居等等。

斯坦因所獲黑水城遺書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英藏西夏文獻除大量的西夏文外，還有為數可觀的藏文、回鶻體蒙文等。寫卷書體主要有楷書、行書、草書，裝幀形式主要有卷子本，蝴蝶裝，粘葉裝。文獻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主要包有西夏供養人題記、發願文、詞咏偈語、語詞音韻以及有關西夏醫學、音樂、道教、曆法、軍事、法律、經濟、歷史、官私印章、族姓、文冊等資料，還有西夏僧人傳記、文集等遺書，特別是梵、夏、藏、漢、蒙、回鶻文注音對照殘卷，極富研究價值，其他還有大量西夏行草、狂草的資料，林林總總，粲然可觀。漢文古籍西夏文譯本類《孝經序》、《孫子兵法》、《將苑》、《經史雜抄》。西夏文字典韻書類《文海》、《同音》、《雜字》、《五音正誤傳》。西夏文

學作品類有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五言詩《新集碎金置掌文》。其他尚有：譯自漢籍的《德事要文》、僧人傳記《寄照國師傳》、《沙門善海奉詔集》；曆書殘頁、醫方和星占卜筮；西夏文法律文書，如刊本及寫本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軍事法律文書《貞觀將玉鏡》，大量的籍冊殘頁，以及西夏文佛經八十多種，這些佛經分別譯自漢文和藏文，有些已經無法找到漢文、藏文的原本，具有獨立的目錄學的價值；有些則具有相互印證的校勘作用，具有重要的版本學價值。比如《諸說禪源集都序干文》和漢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西夏文本和漢文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正是禪學史研究相關材料業已窮盡以後的新的補充。所有佛經和相關文獻的目錄，對於完整勾勒西夏佛教的依持框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斯坦因獲取黑水城文獻以後，按照他中亞探險獲得資助的比例，分別交送給印度新德里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許多藝術品包括絹畫、版畫、木雕等，如斯坦因《亞洲腹地》書中刊布的材料，據英國國家圖書館吳芳思 Frances Wood 女士和原大英博物館韋陀 White Field 先生說明，都不見於英國兩館的收藏，應已劃歸印度新德里國家博物館所有，至今很少有關於這部分材料的情況報道。七十年代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分立，文獻材料全部移交給現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其中西夏文編號 Or.12380，總共為 4000 餘號，有的編號下有多個甚至三十多個殘片，即總共有 7300 多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的各地漢文材料編入 Or.8212 系列。漢文材料，首先由馬斯伯樂 H. Maspero 公布了 607 件；而完整材料即將由沙知先生編輯，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馬斯伯樂已發表材料以外的漢文殘片，則已經由郭鋒先生發表⁽⁴⁾。應當說，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漢文和其他文種的文獻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應當聯繫對照起來研究。

對於西夏文的認識，最早始於十九世紀初，張澍在武威發現西夏《涼州感通塔銘》；十九世紀末，英、法學者考證北京居庸關過街塔門洞壁上六體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直到科茲洛夫材料進入研究領域之後，1909 年俄國伊鳳閣 Ivanov 利用西夏文和漢文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考證了一些佛教名詞，編輯了西夏文字典，才開始了科學的研究；1913 年羅振玉看到後，經過幾年努力，逐漸增補，影印流傳。後羅福苕著《西夏國書略說》，羅福成著《西夏譯蓮華經考釋》，進一步在中國開展了專項研究。隨後的是王靜如《西夏研究》⁽⁵⁾三輯，涉及西夏語言、文字、文獻，考證功力尤深，是當時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獲得了法國茹蓮獎 Julian Price。其中第一輯分別收入陳寅恪先生《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和王靜如先生《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大般若經殘卷考》⁽⁶⁾，首次在國內披露、考證、整理了英藏黑水城文獻《大般若經》的部分殘卷。陳寅恪先生是在王靜如先生對英國所藏文獻譯證研究基礎上，闡述了佛經譯夏為漢的浩繁艱難、以漢證夏的勤苦精誠，西夏文獻譯自吐蕃、中原的不同來源、對譯和意譯的不同方法、西夏文流傳直至明代萬曆之後的資料綫索，等等。到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西夏學蓬勃興起，出現了一批蜚聲國際的優秀學者，如黃振華、史金波、李範文、陳炳應、龔煌城等等。日本西夏學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龍雄 Ikeda Takumi 的《西夏語的研究》⁽⁷⁾、《西夏文華嚴經》⁽⁸⁾等，也是西夏文研究

的經典之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編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獻》⁽⁹⁾自1996年開始出版以來，逐步公佈全部俄藏材料，對整個西夏學的推動具有重大的意義。

英藏黑水城文獻的研究，起步晚於俄國。1917—1922年，斯坦因將這批文書材料全部轉交給大英博物館，並委託歐洲著名的東方學家進行分類整理研究。1920年，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著名的學生馬斯伯樂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漢文文書 LES DOCUMENTS CHINOIS》⁽¹⁰⁾書中按照敦煌、樓蘭、吐魯番、塔里木、黑水城順序，對斯坦因所獲漢文文書進行了介紹，這是一部奠基性的成果。馬斯伯樂對黑水城文獻的介紹從473號到607號。473號是KK.VI.02.a號，為唐『永泰二年(766)六月日蘇潤國牒』，是至今發現黑水城文獻中具有最早紀年的寫本。此後的年代是KK.II.0253.a和KK.II.0270.xx.1.的契丹(遼)『天慶十一年』的15件典押文書等。而479號以下則是元代官私文書、『四部』書、日曆、道教文獻、佛教文獻等，其中KK.II.0238.k《景德傳燈錄》和俄藏文獻Φ.229v同出于『著名的』大塔，當然十分值得注意。⁽¹¹⁾格林斯塔德(E.D.Grinstead)與1975年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書，對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孝經序》做過深入的研究。這是一篇西夏文草書文本，格氏的研究主要是破解西夏文草書和楷書的對應關係，對於識別大量草書文本具有啓迪示範作用。隨後，格林斯塔德在1961年和1967年出版的《英國博物館學刊》卷24第3-4號和卷31第3-4號中，分別撰文研究、翻譯和考證英國藏黑水城文獻殘卷。

四、我們的工作情況

項目啓動

黑水城文獻于上世紀初流失海外，在海外現有兩大收藏基地，一是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外專家已對這批文獻進行了深入研究。二是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外專家對這批文獻的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西北第二民族學院進行西夏文獻和西夏學的研究，就以俄藏黑水城文獻為楔入口，以英藏黑水城文獻為主攻目標。

2002年3月，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啓動了英藏黑水城文獻整理研究項目，成立了英藏黑水城文獻項目組，對英藏文獻進行整理。第一步目標是建立數據庫，將俄藏資料和英藏縮微膠卷進行掃描，以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的玻璃板為單位，整理為22冊打印圖本。按照國際版權公約的要求，掃描成果僅僅用於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內部研究。我們可以以這些圖冊為底本，記載我們識讀和研究的初步判斷。即使是這樣的初步成果，也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我們特別感謝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前任秘書長寧可先生和現任秘書長柴劍虹先生提出的中肯意見和建議：最后目標不能夠僅僅停留在自我服務上，應當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所突破，並通過正式的渠道獲得圖版使用權，按照正式發表的要求來

規範各項研究工作。他們幫助我們聯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擔出版。2003年12月，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在北京召開專題發佈會，學術界的許多領導和專家，都對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共同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獻的協議，表示了極大的熱情，並對現有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見。比如在比定、定名方面還有很多空缺，許多學術難題沒有解決，對於科研必需的資料信息如各項數據也付諸闕如。對於文獻具體出土地點、現有研究成果的信息也沒有搜集完全，甚至還沒有甄別清楚混入的吐魯番文獻。這樣，就使我們感到有必要到英國國家圖書館進行一些現場工作。

組團訪英

到英國的工作，首先是正式獲取館方授予出版權。前期聯繫中，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吳芳思先生多次表示歡迎中英三方聯合進行編纂出版，確認了關於授權和版權著錄方法。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工作期間，吳芳思先生給予了最大可能的幫助，不僅給予了最便利的查閱條件，而且幫助尋找、複製許多材料。

第二是甄別文獻的發掘來源，清點了混入的吐魯番文獻。由于Khara-Khoja（新疆吐魯番哈喇和卓）和Khara-Khoto（哈拉浩特，即黑水城）首字縮寫『KK』相同，縮微膠卷中的『KK』同時包括了兩地的收藏，這就是兩地資料混淆的原因。這項甄別十分重要，諸如佉盧文、龜茲文、巴利文、婆羅謎文等文獻，其通行于漢唐時期，只可能出現在哈喇和卓，不可能出現在黑水城中，否則對於斷定黑水城建立時期將是嚴重誤導。

第三是完整地搜集斯坦因獲取黑水城原始文獻的所有背景資料。在吳芳思幫助下，查閱了英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的關於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的資料，完整復印了關於黑水城發掘的章節；通過李雪松女士的幫助，在網絡查尋了英國各古舊書店的目錄，購買了格林斯坦德和馬斯伯樂等的原版圖書。

第四，也就是核心工作，是記錄文獻的原始數據，鑒別文獻的版本狀況，等等。工作組事先擬訂了著錄的義項，包括原始編號和現編號（原始編號對於分析文獻的組群伴生聯繫十分重要，將來應當編製各個出土地點的文獻索引）、原裝幀形式（包括單頁、卷軸裝、經摺裝、梵夾裝、蝴蝶裝、粘葉裝、殘片）、尺寸（紙高、寬，紙幅，卷心或版心）、紙質（當時可能出現的各種紙，但實際調查結果只是各種不同樣式的麻紙。厚薄色澤淨污等）、紙色、墨色（深淺中等）、寫刻形式（寫本、刻本、活字本、繪畫等）、批注印章等等。總共30個左右的預選項。我們注意到，斯坦因獲取文獻以後，首先對於大多數文獻的出土地點進行了編號。此後，大英博物館在夾存到玻璃板中去的時候，又做了新的編號。經過仔細的考察，我們發現這次編號不是單純地按照從麻袋中取出順序的隨機編號，不是簡單的財產登錄，而是有意識地進行了初步整理。工作者仔細辨認了相互接近的材質和形式甚至內容，某一玻璃板中常常夾存同一類型的殘片，寫本、刻印本、活字本被分別歸屬，而它們却常常是從不同的發掘地獲得的。我們十分驚訝他們對於活字本的鑒別能力，現在越來越受到關

注的活字本，早在夾存入玻璃板以前，已經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合理的歸類。

赴英工作中，我們不僅發現大量活字印本，而且不少是極為稀見的泥活字印本。在中國古籍刊刻史上，活字印本最早見于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然而最早的實物，却是近年發現的拜寺口方塔（始建于1075年）出土的西夏文文獻《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而泥活字印本却極其少見，如果不是親見印本實物，是很難鑒別的。英藏文獻中的泥活字本，其特徵除了木活字的一般情況外，由于多次的重新排列組合，使每個字都磨損了方角，而僅剩圓形的字核。我們可以從這種磨損情況斷定為泥活字印本，但並不是說沒有磨損的就一定不是泥活字印本，只是需要更多的證據。關於刻本和寫本的判斷，格林斯坦德和百濟康義 Kudara Kougi 先后對英國和法國藏品做過一些并不完整的著錄；但是，對於其中活字印本特別是泥活字印本的描述，却將是本次著錄的一項重要發現。

此次著錄，同時也幫助藏館首次建立完整的數據資料。比如館藏編號和斯坦因原始編號，館方並沒有做過對照表，如果按照諸如馬斯伯樂的發表成果來檢索藏品，就會有一定的困難。而記錄這些原始編號，許多是要將卷子殘片透過燈光或者經過特許展開折疊處才能看到，這項簡單而重要的技術數據花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

英國的現場工作基本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即完成黑水城文獻出版的各項準備，和館方代表吳芳思先生明確了出版授權，搞清了文獻的準確來源，記錄了文獻的各種必要數據，購買和復印了大量書籍和材料，取得新的數碼照片用以替換部分質量不好的圖版，拍攝了英國國家博物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必須在首冊採用的內外景照片等。

考察黑水城遺址

我們在英國搜集了收藏和研究情況的資料，以及發掘獲取情況的文字記載。但如果還要進一步追溯，比如斯坦因發掘了哪些地方？斯坦因的發掘和科茲洛夫的發掘，也就是俄藏文獻和英藏文獻有些什麼關繫？黑水城的現狀，包括許多文獻的出土地點的現狀是怎麼樣的？黑水城的地理狀態和生態環境是怎麼樣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應當到文獻的出土地——黑水城，對照歷史資料進一步考察。

2004年11月，在研究了科茲洛夫和斯坦因在黑水城發掘情況的基礎上，特別是根據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Khara-Khoto.》對於發掘現場的描述，以及斯坦因《亞洲腹地》中的大量地圖和照片，我們對發掘地點作了再次考察和拍攝。逐一尋找了科茲洛夫和斯坦因的發掘遺址，並進行了一些記錄。其直接成果就是，在我們這本書中，能夠把斯坦因當時的地圖、測繪圖和遺址照片，和現在拍攝的、包括全場景的廣角照片和局部細節特寫對照起來，使得更多的人了解黑水城，了解黑水城的不同時代和命運。對於遺址在將近百年中的侵蝕變化，也是一個忠實的記錄。從斯坦因和我們現在的照片對比中可以看到，科茲洛夫發掘以後的『著名的』大塔，還剩下了塔身和塔

基，斯坦因到達的時候，這個被定為「K.K.II」的遺址，還有科茲洛夫發掘遺留的雕塑殘片；而經過斯坦因再次發掘以後直到現在，已經掘地六尺，清理到了塔基以下。令人驚訝的是斯坦因竟然還能够在科茲洛夫發掘的同一地點獲得極為豐富的文獻。而記錄為「K.K.II」的寺廟遺址，斯坦因提供的是從臺座到高牆的完整照片和測繪圖，而現在只有高牆的頂端還孤獨地矗立在流沙之上，以下完全被掩埋了；其他地點的積沙情況也是如此，可見近百年來生態的惡化和沙暴的猖獗。我們還考察了黑水城附近的河道、樹林的生態變化，目睹了『怪樹林』中滿目瘡痍、悲壯蒼涼的胡楊秋色，跋涉于從祁連山奔流而來最後消失于居延海地區的額濟納河流域，加深理解了環境變遷對於人類生存遷徙以及文脈斷續的意義。為便于讀者更多了解斯坦因在黑水城的發掘情況，解讀新舊照片的內容和意義，我們繼向達之後再次摘編了《亞洲腹地》的相關原文，作為本書所公布材料的背景介紹。

五、編纂和出版工作

我們非常高興和享有盛譽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進行本書的編纂和出版。該社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從事俄國、法國和國內各博物館、圖書館所藏敦煌、西域和黑水城文獻的編纂出版，至今已經蔚為大觀，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特別是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編纂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獻》十冊有餘，對於西夏學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并積累了出版集成性圖書的豐富經驗。我們的合作取得了互相學習、借鑒的良好結果。全部英藏黑水城文獻，按照目前的編排格式，大約有五冊左右。我們在每幅圖版下面，都完整標識了館藏編號和帶有發掘地點的原始編號，然後是我們比定或者擬寫的題目。這樣做的目的，是有利于讀者直觀地了解某一文獻的出土地點，這一文件和其他哪些文件是同一地點出土的，以便推斷它們的相互關繫。有文字內容的圖版將全部刊出，沒有文字的殘片或者背面，為篇幅計一般不再刊布。在全部圖版完成以後，我們將照例編製《叙錄》、《索引》和《分類目錄》等附件。

西夏文楷體的釋讀，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西夏文的草書，特別是民間文書的不規範性，識讀始終有很大的困難，且不是短期內可以很快解決的。為謹慎穩妥起見，我們對於難以釋讀的草書文本即使有些把握，也不敢臆測，僅標出書寫形式，不勉強擬題。我們期望在材料公布以後，更多的讀者可以有更多的閱讀研究機會，以最大可能地解決草書釋讀的問題。隨着工作的進程，我們將會盡力翻譯殘片的全文，在本書所附《叙錄》中，定題工作還會有所推進。

西夏文佛經，主要有從藏文翻譯和從漢文翻譯的兩個來源，還有許多當時當地民間信仰的材料。所以要從西夏文佛經

比對藏文或者漢文的材料，首先是把西夏文翻譯成漢文，然後和相關的漢文文獻進行比對；或者從外在形式和內容綫索直接與已經發佈的俄藏材料比對。由于學養和資料的缺陷，無論從語言文字還是從佛學內容來講，都是十分艱難的工作。恰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異同印證文句之際，常有因一字之差餘，或一言之缺少，亦須竟置此篇，別尋他品。往往掩卷躊躇，廢書嘆息。故即此區區檢閱之機械工作，雖絕難與昔賢翻譯誦讀之勤苦精誠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爲外人道者也。』⁽¹²⁾ 對於暫時不能定題的內容，我們盡量將西夏文譯出，著錄在《叙錄》里面，以便各方面學者深入研究。

英國國家圖書館早期製作的縮微膠卷拷貝質量并不理想。隨着數碼時代的到來，圖書館方面有意對館藏敦煌、西域和黑水城文獻采用數碼技術重新復制，并逐步在《國際敦煌項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 IDP）網站上公布。但是，由于技術標準、版權保護和其他多種原因，這個非常有有意義的項目的進展不是很快。爲支持這次紙面出版，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同意分批提供已經數碼化的圖版。對於污漬和劃痕，我們不得不借助于電腦進行修整。可以讓讀者放心的是，修整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獻紙面外圍，以及褪除拍攝時所用的黑底色；對於可能涉及內容的部位，采取保守穩妥的態度，不作描修，以避免發生新的疑問。

《英藏黑水城文獻》出版，是我們具有比較完整意義的科研成果，也是學術界許多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由于出版得以使材料化身百千，研究工作必將蓬勃地展開，這是由學科發展的規律所證明的。但願我們的工作能够有利于西夏學的長遠發展。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注

- (1) [德]傅海波 Franke Herbert、[英]崔瑞德 Denis C. Twitchett 編 史爲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據說蒙古人處理党項皇室的做法和對中興府居民的異乎尋常的大屠殺，是事出有因的。這種做法「意味着要爲成吉思汗來世提供一支可觀的衛隊」，這樣做的結果，敵對國王的「德行」就會轉化爲一種服務于死去的大汗，并對他大有助益的保護性的精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249頁。
- (2) 1932年，向達先生節譯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取名爲『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刊登于國立北平圖書館刊西夏學專號上。
- (3) 克恰諾夫：《俄藏黑水城文獻序言》：『如果我們比較一下（科茲洛夫）6月12日和6月15日的日記，就可以發現，隨着發掘的進展，科茲洛夫時而說扔得亂七八糟，時而說放得井然有序。』見《俄藏黑水城文獻》克《序》第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 (4) 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
- (5) 王靜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輯至第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至十二。1933年，北平。